

证伪、求实——再谈高教发展数据的国际比较

More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data of Higher Education

周贝隆

(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员 北京 100816)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与其他国家有关统计数据的比较中找差距,从而提出发展的目标对策,理所当然地成为诸多宏论著述的流行模式。但是,如果所依据的关键数据的可靠性、可比性有问题,就难免出现立论根本动摇的尴尬情况,即使所用数据确属可靠无误,也还有一个如何正确看待和运用它们的问题。

《科技导报》1996年第5期有一篇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文章(作者肖广岭,简称“肖文”),此文首先以《中国统计年鉴》为依据,分别将有关数据列表说明“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和“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国际比较”,从而论断“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差距、潜力”所在:

——1980~1993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生年均增长率(6.31%)太低,低于同期年均国民收入增长率(9.65%),发展还是相对缓慢的。

——从国际对比看,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人数,美国和印度分别是我国的30多倍和3倍多。“假如我国高等教育达到印度人均水平,那么1991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将不是204.4万人,而(应)是663.1万人”,还应增加两倍多!

这种用美国(我国追赶的长期目标)、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和同为低收入的大国印度的高教发展数据的“巨大差距”来警醒国人,已成为许多主张加快高教规模发展者立论的依据,并且似乎取得多数人的“共识”,用意未可厚非。但是,如何正确地辨别和使用这些数据,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几年前笔者写过一篇关于高教发展问题的有关数据分析的《札记》(载《科技导报》1993年第5期),现进一步结合肖文所举的一些广为流传的中、美、印等国高教比较数据作一些分析和证伪,以就教于通家。

表1 一样数据,两样比较结果(万人)

	中国	美国	日本	印度
肖文所称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a)	204.4	1436.1	288.7	480.6
高校在校生人数(b) (UNESCO)	1991年 1995年 360.8(c) 552.2	1436.1(1991年)	289.9	无可信数据
高校毕业生数(d) (UNESCO)	1991年 1995年 126.8 147.3	1985年 1990年 183.0(e) 202.5	1991年 69.7	1990年 121.3
其中研究生	3.3 3.9	39.4 44.8	3.3	29.9
本专科	123.5 143.4	143.6 157.6	66.4	91.5
获得同样数量毕业生所需相应高校在校生规模	... 401	1215 ...		

(a)肖称: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印、泰为1990年数字,余为1991年数字。
按,《年鉴》数据来自UNESCO,其中并无印度近年数字。
(b)本表及文中所引国外教育数字除另有注明外,均出自UNESCO历年《Statistical Yearbook》。
(c)其中普通高教213.2万人,以下中国数字均按UNESCO口径取自《教育统计年鉴》。
(d)取UNESCO《Statistical Yearbook 1995》中的最近数据。
(e)相应的1980年在校生1209.7万,1985年1224.7万,变化不大。
(f)不包括私立学校。

1. 肖文忽视了统计口径的差异,因而扩大了高教规模差距的假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而UNESCO依据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高等教育的口径定义很明确,包括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及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无报名注册手续

的)其他高等教育(在我国主要为“成人高等教育”),不仅包括本、专科,还包括大学后的研究生层次。肖文所举他国数字应为 UNESCO 全口径的数字,唯独我国用的只是普通高校本专科的数字,连 8.8 万的毕业研究生也未计及。由于难以取得口径完全规范的各国统计数据,UNESCO 在每年以统计年鉴公布数字时对偏离的情况均一一地注明。如,中国:只是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数字;日本:还包括远距离教育(据日本《文部统计概要》,1992 年“通信制”高校在校生有 21 万人);至于印度:包括了不属高等教育的“中间学校”和“大学前教育”,数字显然大于事实。即使如此,由于印度教育统计的缺陷,UNESCO 从 1983 年起屡屡将它作为无数据处理,停止公布印度的高教规模数字。按照 UNESCO 的口径,我国 1991 年高校规模应为 360.8 万人(包括成人高校 147.6 万人),不是 204.4 万人。按可比口径,我国高教在校生规模早已超过日本,当年大约是美国的 1/4,而不是肖文的 1/7(见表 1)。实际上,90 年代以来,我国高教在校生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显著领先于经济(GNP)的位次。平心而论,出现这种判断失误的责任完全不在肖文的作者。不凭道听途说,而以国家统计局的权威出版物为依据,说明作者是慎重的。我国的现代统计事业草创不久,《年鉴》在处理引用国内外数据时偶尔失察,也不能苛责,相信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会逐渐臻于严密、准确的。

2. 尽管规模相差悬殊,我国每年高等教育的实际毕业人数已跃居世界前茅,赶上了 1985 年美国水平

中美两国的国情有很大差别,我国高等教育入口紧,毕业率高,而美国则宽进窄出,毕业率低得多。因而我国可以以小得多的在校生规模而获得同样多的大学毕业的专门人才。

1995 年,我国高校本、专科毕业生共计 143.4 万人,与美国 1985 年(本专科毕业生 143.6 万人)几乎完全相等,差别仅在于层次结构。美国 1985 年毕业的研究生(39.4 万人)为我国 1995 年(3.9 万人)的 10 倍。研究生来源于大学本科毕业生,并不能增加专门人才的数量,就是说,我国高教一年毕业的专门人才已与美国 10 年前相当了。整个 80 年代上半期,美国高教规模变化不大,在 1 200 多万人左右徘徊。以平均 1 215 万人,1985 年获得的毕业生 143.6 万人计,每百名在校生可望获得毕业生约为 $(143.6 \div 1215) \times 100 = 11.8$ 人;考虑到我国 1991~1995 年在校生每年平均以 11.2% 的速度增长,如以 3 年前即 1992 年为基数,我国 1995 年获得毕业生 143.4 万人,约相当于 $360.8(1991 \text{ 年的规模}) \times 1.112 = 401$ 万在校生的贡献。每百名在校生可望获得的年毕业生则应为: $(143.4 \div 401) \times 100$

$= 35.8$ 人。就是说,我国可以用不到 400 万在校生的高教规模获得美国 1 200 万在校生同样多的专门人才,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优点。须知,80 年代中期,美国仅政府每年用于高教的经费即高达 1 000 亿美元,约占整个政府教育支出的 40%,作为发展中的低收入国家,我们无力也不应去与美国攀比高教的“普及”。

3. 不能以一段时期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低于经济增长而无视我国高等教育超前发展、强劲势头的事实

那种认为高教规模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即非正常的观念,笔者不敢苟同。关于高教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长期发展目标看,要实现高教与经济增长持续协调发展,我国经济每增长 3%,高校毕业生的社会拥有量应相应增长 2%,拙文《高教发展战略选择》(载《高等教育研究》1996 年第 2 期)有所论证,不妨参考、批评,不再赘述。现阶段,发展高教事业,在于为社会培养适需的专门人才。社会上高教毕业生拥有量是多年高教毕业生积累的结果,其增长不完全以短期高教规模的消长为转移。在这里笔者只想指出一个客观事实:从建国以来我国高教发展几经波动反复,但从总的效果、社会上的高校毕业生拥有量增长来看,是大大的超前经济增长的(见表 2)!

表 2 我国高教毕业生社会拥有量的增长

	拥有量(万人)	增长指数	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值指数
1948	17.3		
1952	26	100	100
1959	67	258	202
1970	240	923	295
1983	448	1723	676
1994	1497	5748	1978
2000	大于 2100(预计)	大于 8780	不高于 3500

1952 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引人注目,1994 年 GDP 比 1952 年增长了 18.8 倍,年平均增长 7.4%;而社会上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拥有量(不难从有统计的逐年毕业生数量和宏观统计的按龄死亡率计算出相当准确的数字)却跃增了 56.5 倍,年平均增长 10.1%,大大超过经济增长。表中 2000 年的数字是基于维持高教 1994 年的规模不变算出的,实际的发展只会更多。

4. 即使是正确的定量比较,也只能作发展高教决策的参考,不能作决策的充分依据

不同国家发展数字的差异客观存在,但据以追求“缩小差距”并不见得是合理的决策。如美(人均 GNP 24 740 美元,1993 年,据世界银行报告,下同)、日(31 480 美元)、德(23 560 美元)同为高度发达的

工业化国家,而1990年万人中的大学生数日(233人)、德(前东、西德分别为268和281人)都只有美国(559人)的一半。究竟是日、德应加速发展以接近美国,还是美国应控制发展来“缩小差距”呢?面对激烈的世界竞争,似乎美国更加畏惧日本。在一片教育危机声中,各国均在谋求教育兴国之道,但未见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和舆论界像我国这样在这种表面的差距上大做文章。近二三十年的现实却是,美国的高教入学率不断提高,日、德却我行我素,增长甚慢。至于高校规模“印度人均水平是我国的三倍多”这一结论,亦有误。首先,与事实相距较远,印度的人口为我国的3/4,其大学年毕业生数也恰好相当于我国的3/4(表1);其次,印度六七十年代急剧膨胀起来的高等教育(在校生1960年102.9万人,1979年号称达543.6万人的高峰)早已为国外教育界和经济界所诟病。有迹象表明,印度决策者近来也在反思和调整。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印度水平来评价我国高教规模。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一些论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有选择地片面引用国外数据,不仅于求实的学风无益,一旦影响决策,还有图虚名遭实祸之虞。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是韩国。1980~1992年GN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5%,创造了经济的奇迹;其高校毛入学率(1991年为40%)高于大多数OECD的工业化发达国家,似乎足证高教的高入学率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其实,高教毛入学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30%左右)或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还有菲律宾(28%,1991年,下同)、秘鲁(36%)、委内瑞拉(30%)和阿根廷(43%)等国,引人注目的是除韩国以外的其他四国的高入学率不但并没有带来

经济的高速发展,1980~1992年间反而都出现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从-0.8%(委)到-2.8%(秘)不等。能否由此又引出另一个极端的结论:高教规模大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呢?无怪乎,UNESCO的《1993年世界教育报告》在分析了工业化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发展了的高教情况后都得出了“现有高教规模与经济发展已没有关联”的结论。中央决策开发浦东,上海顺理成章地考虑如何向国际大都会城市看齐、“接轨”,相应地论证上海高教发展的目标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首先容易想到的是与美国的纽约等城市相攀比,而不是与新加坡这样高度发达的城市国家(只有高等院校6所,UNESCO的数据为1980年毛入学率仅8%,1982年本、专科毕业生7820人,1990年无数据;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9年世界资料,1987年在校44746人,每万人口为169人,相当美国的30%)比一下,甚至与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1992年本专科毕业生18906人,而上海1994年为31771人)比一下呢?其实,纽约是美国的一部分;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上海的高教发展恐怕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作为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从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其决策也并非仅仅是上海自己的事。

总之,决策需要比较,好的决策过程应是各种方案比较择优的过程。但是这种比较,决不能是简单地引用若干外国数据“为我所用”那种比较,而只能是从自己的国情实际出发,统筹权衡,走自己的路。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包袱,在我国是“科学决策路漫漫”。但愿在我们的决策研究中多一些科学精神,减少一点盲目性和宏观的失误。

(责任编辑 冷远猷)

(上接第8页)

要的话,“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评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很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这段话说明了创造新知识是一项艰苦的劳动,社会应当为此准备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要有配备先进仪器、集中优秀人才的研究基地,要有足够的运行经费,要有促进创新的交流制度和学术气氛。掌握知识产权的多少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决定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从马克思的话里能够了解到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创新知识的价值远远超过去模仿、引进的知识价值的本身。

普及科学,破除迷信

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后,社会上宣扬鬼神的迷信盛极一时。上海有灵学会,出版《灵学丛志》;北京有悟善社,出版《灵学要志》;当时,风水算命,卜

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迎神,说鬼,无奇不有,横行国中。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发起下,新青年杂志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对迷信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反击,迎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般来讲,在社会变革的时期,人们不了解发展的趋势,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或发横财,或遭破产,都有神秘和不安定感,在缺少精神支柱时,人们感于今生,期于来世,以宗教信仰或迷信活动来寻求心理安慰,都有一定的社会根源。时下迷信的泛滥与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情形何其相似,就说明了这一点。

目前我们破除迷信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用迷信活动诈骗的行为应进行法律制裁和舆论谴责,并以普及教育和科学知识等多方面工作相配合,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识是根本的措施,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责任编辑 蔡德诚)